

一眼四千年，一馆见团圆

——“对话”蛋壳黑陶高柄杯

新大众文艺， 草根文艺的翻新？

□ 本报记者 石念军

新大众文艺浪潮如火如荼，各行各业的素人创作者粉墨登场成为主角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曾经层出不穷的草根明星群体，甚至会让人恍惚：新大众文艺是不是草根文艺的称谓翻新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从草根文艺到新大众文艺，不是简单的名词更替，而是社会文化生态深层结构性变革的现实呈现。

新大众≠草根

新大众文艺不是草根文艺，是因为新大众与草根本就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

草根强调对立，本质上是社会学范畴的阶层概念，主要是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相对弱势的阶层，往往带有基层或底层的身份标签。

新大众则重在团结。作为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参与者和主创者，新大众与阶层无关，而完全聚焦创作者的行为主体维度，其核心特征是职业身份的非专业性。比如，一位从事文艺创作的数学家、快递员或企业家，只要是职业文艺工作者，都可以被视为新大众创作者。显然，他们可能是草根，也可能不是。相对准确的说法是，新大众并不局限于草根群体。

与阶层化特征浓郁的草根文艺相比，完全褪去阶层色彩的新大众文艺已然构建起最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。同时，超越阶层的主体特征，最大限度地卸下为群体代言的创作包袱，进一步释放文艺创作的空间性和自由度。

草根文艺时代，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往往与群体身份紧密绑定，个人表达自觉或不自觉承担着为群体发声的社会功能。

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职业身份变得异常多元。程序员可能是国风音乐的制作人，外卖骑手可能是哲学短视频的博主，退休教师可能是网络科幻小说的作者。他们不再被简单的“草根/精英”二元框架所定义，而是以具体的创作者身份直接出场。其创作初衷并非为某个群体发声，而是纯粹的个人兴趣、才华展现或生活分享。

当创作不再背负责任的重担，个体独特的生命经验、审美趣味和思想观念便得以充分释放。从草根到新大众的主体性变迁，实质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在文艺领域的深刻体现。

从边缘到主流

草根文艺固然是社会文化生态的组成之一，但它始终未能摆脱夹缝中发声的底层困境。

作为当下主流文化生态的典型表现形式，新大众文艺就是当之无愧的主流文化代表，其创作者同样藉由技术环境的加持，从台下走到台上，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主角和文化主流。

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普及应用之前，草根创作者面临的是严格的传播渠道管控和稀缺的展示资源。其创作往往局限于地方性的、小范围的传播——街头巷尾的表演、手工传抄的诗集、地方电台的点播节目。技术的匮乏决定了表达的局限。草根文艺的内容常常是对有限生活经验的直接反映，形式上也较为单一。

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工具民主化彻底消解了专业门槛。一款千元智能手机配备的摄像头，其性能已超过十多年前的专业设备；各类剪辑软件提供了一键成片的智能模板；网络发布平台几乎实现了零成本、零门槛的全球传播。技术已经不再是区隔专业与业余的壁垒，而是赋能每一个潜在创作者的平等工具。

技术民主重塑生产关系。创作者与观众通过评论、弹幕、打赏、二次创作等方式实时互动。以网络小说为例，读者的反馈常常直接影响情节发展，甚至决定人物命运。传统的“作者—读者”单向关系被时时刻刻的深度互动彻底改变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共同体真正映入现实。

算法推荐系统重构审美权力。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再仅仅由专业评论家或评奖委员会定义，而是由点击量、完播率、互动数据等指标共同反映。“算法民主”虽不完美，却使大众趣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重，催生了众多主流精英视野之外却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形态。

发展无止境

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到来，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个体的成长速率和空间。个体正从社会结构的被动承受者，转变为利用新技术、新平台主动开创自我、参与社会建构的积极主体。

新大众文艺提高了个体超越自身角色的可能性，个体的价值不再仅仅由其社会身份决定，而更取决于其创造力、独特性和与公众的连接能力。它促进了人的创造潜能的普遍激发。当创作成为千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，社会的整体创造力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。这种创造力的普遍化不仅能够产生更加丰富的文化成果，更可以培养公众的创新思维和解题能力。

新大众文艺浪潮中，越来越多的人将个人的兴趣爱好、创造才能转化为社会认可的价值，甚至发展为新形态的职业和事业。他们的实践实际都指向一个更加人性化的未来，那就是工作与创造、生计与意义不再是分裂的，而是有机融合的。

概念的变迁总是源于现实之变。新大众文艺注定不是草根文艺的简单延伸或规模扩张，而是社会发展在文艺生态中的时代投射。新大众文艺浪潮方兴未艾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永无止境。



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

探展记

□ 本报记者 张依盟

四千多年光阴流转，蛋壳黑陶高柄杯再次映入世人眼帘。

0.2毫米的极致之薄，釉面般的光洁质感——它一出现，就引发了惊叹。这般鬼斧神工，究竟如何炼成？它曾是酒器、礼器，还是精神信仰的化身？为何独独绽放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沃土，却如流星般璀璨而短暂？是怎样一个时代，愿倾注如此虔诚与心血，完成这一场不计成本的极致创造？

今天，我们以“对话”的形式，走进山东博物馆明星文物展，探寻蛋壳黑陶高柄杯如何穿越时间长河，成为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。

桂冠史前

薄如蛋壳泛幽光，城子崖下初显藏。四千寒暑重见日，举世惊此龙山陶。陶魂熠熠耀华芒，绝艺千秋叹无双。

问：请先介绍一下自己。

答：我叫蛋壳黑陶高柄杯，来自龙山文化时期(距今约4400-3800年)。1973年，我在日照东海峪遗址重见天日，是蛋壳陶杯形成阶段的典型器物。

我身高26厘米，口径9.4厘米，器壁仅厚0.2到0.5毫米，体重约90克。整体分为三部分：上部是一个装饰六道凹弦纹的深腹小杯；中部是高柄，柄腹透雕中空，形如纺锤，又似倒置的花蕾；下部是覆盆状的底座。

最巧妙的是，我的柄腹内藏有一颗陶丸。轻轻摇动，陶丸碰壁会发出清脆声响；静置时，它又能帮助稳定重心。人们常用“黑如漆，亮如镜，薄如纸，硬如瓷”来形容我，我想，这大概是对我最好的概括。

问：为何考古学家奉你为史前地球文明的巅峰之作？

答：我身负三大陶艺之“最”，立于史前文明之巅，当然毫不“恐高”！

首先，我由世界上最早的手工机械制成——快轮制陶。考古发现，轮盘转动很可能依赖于一种动力传递设备，可以说这是最早且最精密的手工机械。拉坯与车制相结合，展现出了高转速、高精度的轮制技术巅峰。

其次，我拥有史前最先进的烧制技术——高温渗碳成黑。这项工艺包括选料(反复淘洗陶泥)、成型(快轮分段成型)、装饰(镂刻纹样)、打磨(呈金属光泽)、烧制(匣钵+渗碳)。

最后，我是世界上最薄的陶瓷。我最薄处位于盘口，厚度仅0.2毫米，堪比两张A4纸的厚度，却能历经数千年而不裂。相比之下，近亲瓷器直到明代才出现薄胎瓷，其厚度约为0.5毫米。我采用分段成型工艺，这打破了传统一次成型对器物高度的限制。杯、柄等各部件经快轮分别制作，适度阴干后移上陶轮，在旋转中被修刮至极致薄透，再进行镂空、划纹、打磨等处理，最终拼接成器。

问：跨越四千年，你如何得以再次与我们相见？

答：1930年，我的老乡、考古学家吴金鼎(1901-1948，字禹铭，山东安丘人，龙山文化发现者，中国第一代现代考古学者)和他的同伴，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首次接触到了我们的碎片，从此我们有了名字——

蛋壳陶

1936年，在日照两城镇遗址，考古学家发现我们的真身：由盘口、杯部、器柄、底座四部分构成，因而得名——蛋壳黑陶高柄杯。

1973年，我终于从日照东海峪遗址中破土而出，人们夸我为蛋壳陶家族中最精美的一员。

如今，我家族中已有超过百件得以修复原貌，形态多样，原本主要分布于潍坊、临沂及淄博、青岛一带。现在包括我在内，共有10名成员因展览需要，相聚于山东博物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日照市博物馆、日照市博物馆、潍坊市博物馆所藏的三件蛋壳陶杯，均为首次离馆展出。它们各有渊源：潍坊市博物馆1975年出土于胶县三里河遗址，具有大盘口、深尖底独特造型；山大馆藏杯1985年出土于泗水尹家城遗址，虽胎体较厚，不属于典型“蛋壳陶”，却为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；日照馆藏的这件珍宝，则与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同出一脉，工艺与形制相近，同属东海峪龙山文化的经典之作。

藏礼于器

薄壁乌光蛋壳轻，高柄擎来酒香盈。非为寻常饮宴具，专奉权贵显尊名。玄色千年融血脉，礼出东方自此明。

问：你从何而来？

答：我的“祖先”是大汶口文化黑陶高柄杯。大汶口文化晚期，分段成型和镂空技术进一步发展，器壁已经较薄，厚度多在1.5至2毫米之间。高柄也从圆柱形向橄榄形演变——这直接孕育了我的诞生。

我出土于大、中型墓葬或祭祀遗存中，在墓室内被单独安置在主人身旁显要位置。这也暗示，我的主人应是掌握着社会财富和权力的某种特权阶层。

问：为何你们数量少、仅杯形、限海岱、追求极致黑？

答：这正是我们作为高级礼器的特殊身份象征：数量稀少，因专用于庄重的礼仪场合；崇尚黑色，寄托着先民对黑夜与未知的崇敬；而仅分布于海岱地区，也印证了“礼出

文明自生

蛋壳黑陶薄如纸，乌光玄亮证古史。深埋千年醒世言，不惜西风根自生。龙山陶魄照汗青，华夏源流自此定。

问：恭喜你当选为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，但大家也好奇，你“薄如蛋壳”的娇贵身躯，凭什么代表厚重的齐鲁文化？亚醜钱等“强者”怕是不服呀！

答：的确。商业贿赂乃商王朝礼制重器，随“亚醜”族镇守东方，象征商代经略东土的权威；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身上公认的中华文明曙光图腾，是齐鲁大地更古老的源代码；红陶兽形壶也比我更早见证了东夷文明，也更显敦厚可爱。它们各有分量。但我，则是东夷文明之光，印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。

20世纪初，瑞典地质学家、考古学家安特生基于不完整的考古材料，提出了“彩陶文化西来说”，随之“中华文明西来说”一时风行。正是我们蛋壳黑陶，独一无二的东方工艺，宣告了中华文明的独立自成。

我的“薄、黑、亮”，在同时期乃至更早的陶器中是孤绝存在：其一，当黄河中上游乃至两河流域、古埃及、印度河文明多以彩陶闪耀时，我们已掌握薄胎工艺和高温渗碳技术，达到“薄如纸，黑如漆”的境界；其二，相似的黑陶技术，在地中海伊特鲁里亚文明中出现，已晚于我们约两千年。

立春之日赶年集

□ 逢春韵

等，被赠予大集边上的“星星书屋”。

一旁，书画艺术家孙旭、马驰、于浩然等正忙着写春联、写“福”字。当红纸黑字在他们手中徐徐展开，我感到一种奇妙的联结——文字的力量，在这最寻常的交接中，完成了它最本真的抵达。刘雪樱老师的案前围满了人。刘雪樱老师也让我写，我忐忑着怕写不好，刚欲下笔，一位老太太却笑着大声说：“不用你写，俺写了半天，就想请她写，她写得好，给俺写四个‘福’字吧。”“哟！这事儿弄的，我一脸尴尬地将笔递回刘老师。老太太不好意思地朝我一笑。收摊时，刘雪樱写了多少个‘福’？两百多个吧。刘老师说虽然累，心里却满是欢喜。她还把自己的画册《美在深情》分赠给几个书画爱好者。

我还遇见了开展“马年送健康、中医药生活化”义诊的中医专家们。几张条桌在喧闹的集市边一字排开，桌上铺着素净的白布，几盏小小的脉枕，几摞健康教育册子，便围出了一方安静而专注的天地。穿着白大褂的大夫，正凝神为一位乡亲搭脉，手指轻按，眼眉微垂，周遭的嘈杂仿佛瞬间退去。旁边的医生一边查

看另一位顾客的舌苔，一边温言询问饮食起居。在这份专注与信任的轻声交流里，我看见了另一种形式的“望闻问切”——它切准的，是这片土地上传衍不息的生活脉搏。

南山高跷队也来助兴。我第一次见到两米多高的高跷腿，实在惊叹。队伍中，一个踩着一米高跷的小女孩格外引人注目。旁边，69岁的李发春告诉我：“这是俺外甥女，名叫王米乐，今年5岁，四门塔村的，去年就迷上了踩高跷。”济南市作协主席张鸿福说：“南山高跷有名啊，已被列为南部山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”

柳埠大集一路延伸到山脚下。抬眼望去，凤凰山、透明山似乎也该改叫“泰山”了吧？杨树与槐树的枝杈间，稳稳坐着一个个鸟窝。俗话说：“鸟窝不落无福之地。”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赶老家景芝大集的情景。如今景芝大集上的“三件套”——糖葫芦、炸肉、山药豆——也成了网红。只是那时的树上少见鸟窝，鸟窝多被饥肠辘辘的老百姓捅下来当柴烧了。人穷的时候，连鸟都打下来吃，哪还容得下鸟窝呢。

和摊主闲谈，听他们讲祖传的手艺，说马年的盼头。那些质朴的话语，本身就是最好的文学素材。山东省作协创联部主任邱兆辉说，作家们多下来走走、感受感受，一定会有新收获：接地气，才有文气；有文气，才有灵气；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，必定能在生活的现场，敏锐捕捉并传递那些最早破土而出、坚韧又蓬勃的春意。这春意，藏在延续千年的市声里，落在普通人认真过日子的热望中，生生不息。

我想，无论是柳埠大集的山野清风，还是景芝大集的酒香古韵，都是齐鲁大地“大集文化”这棵大树上绽放的不同花朵。在电商席卷一切的今天，这些大集依然生机勃勃，正因为它们提供的不仅是商品，更是无法被替代的面对面的温度、扎根地方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记忆的绵延。赶一次集，就像翻开了一部地方志中最为生动鲜活的一页。

时近中午，朋友邀约，我们来到山脚下一家没有招牌的小饭馆。灶下柴火正旺，南山豆腐、葱炒鸡蛋、炖鸡的香气扑面而来，还有隔着面皮就能辨别出的韭菜、白菜饺子。那是浓浓的、属于年的味道。

小逢观星

腊月十七，正逢立春。用“春意盎然”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天，并不因因节令的契合——济南城外的风确实柔和了几分，阳光宛如被泉水涤过，清澈地洒落在柳埠大集一张张舒展的笑脸上。大集入口处，花盆里立着几枝腊梅，黄澄澄的花苞在尚显料峭的空气中，静静吐着清冽的香。原来这春意，正是从这枝头，悄然迸发出第一缕生机的。

柳埠大集位于济南市南山区柳埠街道柳西村。在这里，我参加了山东省作协组织的“黄河大集”主题创作实践文学志愿服务。我看见了作家常芳，安亦然的身影，还有山东公益阅读推广人张丽娟。他们带着自己的作品，与大集上的读者面对面交流。《山东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《百家评论》等文学期刊的编辑也带来了新出版的刊物，耐心解答基层作者关于投稿的疑问。《山东作家作品年选》、黄河文化主题散文集、本土作家作品集和经典文学读物